

第27章

經濟成長

專精生產
工廠生產
工業資本累積
知識的應用
企業家的角色

台灣的經濟發展經驗固然並非是全然愉快的，但倒還被為不少人稱讚為「奇蹟」。自光復以來，平均個人國民所得每年都維持著相當幅度的成長。即使有些經濟波動的現象，也只是此成長率的忽大忽小，而不是正負的變化。儘管有經濟波動，薪資階級已習慣了去猜測次年的調薪幅度。企業家們似乎也形成了一種信念，相信自己只要經過三、五年的努力開拓，便能打拼出一片屬於自己的天空。對於政府官員，這經驗則十足表現在每年公佈的高經濟成長率數字。雖然工作、收入或有暫時拮据的時候，但人們早已習慣地把它比擬為月圓月缺現象。在近半世紀歲月的經驗中，「經濟會成長」好似天經地義的事；尤其，對在富裕環境下長大的「新新人類」而言，它更不是什麼值得關心的大事，甚至於遠比不上找個暑期打工的機會重要。

鑒於當前年輕人不太喜愛勞力型的工作，以至於企業家紛紛到海外或中國大陸投資等現象，許多的中年人士開始擔憂台灣的經濟成長是否還能繼續下去。更有一些評論者，不僅創造出「產業空洞化」、「淺碟經濟」等否定性的辭彙，更悲觀地預測台灣經濟「必然崩盤」。樂觀有助於個人去展現他的雄心；悲觀則會消沈人們的鬥志。然而，影響經濟成長的因素並非出於感情或心理的激動，否則中國大陸在毛澤東時代的「大躍進」運動，早就讓大陸的經濟表現令人刮目相看，甚至於有超越英美等國的可能。在我國歷代學者的談論中，整個國家的經濟狀況是隨朝代盛衰同步起伏的。因此，他們總是期盼聖君賢相的誕生，以至於能開創出長治久安的繁榮社會。就世界歷史而論，經濟出現較快速的成長現象也只是在西方工業革命後才發生的。在近代的經驗裡，中美洲國家的經濟發展在二十年前突然停滯下來，而台灣與南韓卻以快速的步伐接近一些歐洲國家的國民所得水準。另外，儘管印度的經濟

狀況似乎仍然欲振乏力，我們也知道其他的東南亞國家與大陸也都開始快速成長。這些例子顯示出，經濟成長不是必然的，同時在各個國家間也可能有很大的不同。

在接續上一章對經濟波動的討論之後，本章將討論環繞於維持長期經濟成長的一些問題。經濟成長是如何開始的？一旦開始之後，是否就會不斷地繼續成長下去，還是也可能會發生停滯的現象？反觀我們自己的經驗，台灣的經濟成長是如何開始的，又何以能夠維持半世紀的持續成長？本章裡，我們將從基本理論與一些實例對這些問題做一深入淺出的討論。

專精生產

根據上章所述，集體性指標可以提供個人決策所需的一些資訊。這些資訊，橫的說，有助於知彼此；縱的說，有助於鑑往知來。至於個人將如何利用這些資訊，則非我們所能預期。儘管經濟成長中每一個人的改變未盡相同，長期的經濟成長必然意指人們的福祉改善。因此，本章以集體性指標之一的**平均每人實質國民所得成長率**來概括性地衡量**經濟成長**。我們將先從理論上解釋造成經濟成長的因素，然後再討論長期成長的維持。對於珍惜經濟成長的讀者，我們藉由以下的討論說明經濟成長與制度之間的關係。

為了簡化複雜的問題，本節將依據從大陸出來的年輕經濟學者楊小凱所建立的理論模型進行討論。在此模型的架構與假設下，組成社會的每一個人都喜好多樣化的消費財，而且對每一種消費財的效用評價也一致。在生產技能方面，一個人在每一時點上能夠付出的總勞力都是固定的，故他必須分配勞力去生產不同的消費財。讓我們再回頭考慮挑水或捉雞的思維性實驗，我們曾經發現捉雞與挑水都會有所謂的**熟能生巧**的現象。這個現象的意義為何呢？如果昨天挑水或捉雞的勞力付出與今天的勞力付出相同，則熟能生巧的意義是：今天的勞力成果更豐碩。如果昨天與今天的勞力投入經驗與因而獲得的知識可以累積起來，則未來相同勞力的投入可以得到更多的產出。當然，經驗的累積並不一定與勞力成固定的比例關係。但無論是何種的關係，熟能生巧意味著不僅今天的勞力投入有助於今日的果實產出，昨天的勞力投入在轉化為經驗與知識後，也有助於今天的生產。因此，熟能生巧的特性還把各時點的活動**連在一起**，而不再是相互獨立無關的。以某人每日花一小時工作為例。若不考慮熟能生巧的效果，則他每日的產出都是相等的。在考慮熟能生巧的特性後，則他的生產效果將會逐日增加。每日相同的時間投入，卻能在未來得到持續增加的產出量，這即是最簡單的**經濟成長**的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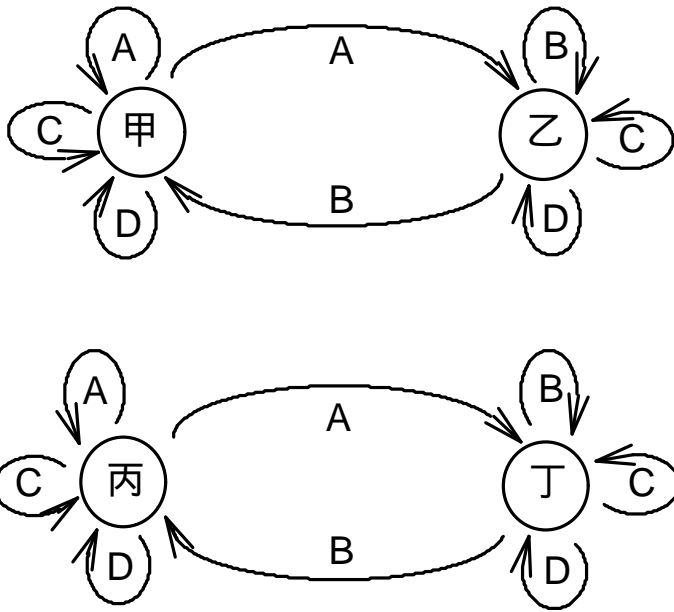


假設在每一種消費財的生產上，各個人所引用的生產技術都具有熟能生巧的特性。於是，在此假設下，隨著生產經驗的增加，個人在消費財生產上的單位因素投入的產出便會不斷增加。譬如：若一個人將一年的勞力平均用到三種工作上，則在此三種工作的逐年產出量上可能都會經驗到 $1/3, 2/3, 3/3, 4/3, \dots$ 的增加速度。然而，此假設尚不足以推演出，社會裡的各個人，在面對經濟利害的選擇下，會自然的逐漸形成現代專業、分工的生產結構。為此，我們再假設每一種消費財的生產技術都具有報酬遞增的特性。亦即假設：投入的工作時間增加一倍時，該消費財的產出增加量會多過一倍。於是，如果假設兩種消費財在市場上的價格相同，則一個人把勞力等分在兩件不同工作上的總產出的市場價值，要比專力於一件工作的產出的市場價值為小。

這個結論是以個人能把他的產出拿到市場交易為前提。個人必須能經由交易取得一些自己沒有生產的消費財，才能進行專一消費財的分工生產；否則，他就必須自行從事多樣消費財的生產。不論間接或直接交易，交易都會牽涉到交易成本。假設交易成本只受交易之消費財種類的影響而與交易量的大小無關；亦即，當交易的消費財種類愈多時，交易成本愈高。這個假設是很直覺的。如果我只生產稻米一樣，而我需要的還包括柴、醬、醋、鹽、油、茶等，則我必須去市場上以米交換錢，再以錢交換以上的消費財。顯然的，隨交易的消費財種類增加，交易次數必然增加。因此，只要每次交易都必須付出成本，則總交易成本便隨著交易的消費財種類的增加而增加。底下，我們便從這些很簡單的假設來推演專業化分工生產的演進情形。

首先，在不考慮轉賣、套利的簡單情形下，我們可以推知：一個人不會買與賣同一種消費財。如果一個人買與賣相同的消費財，則他必須從事兩次交易活動，並花費兩次交易成本。相反的，他可以自行生產足夠的該消費財；如此，不但可以省下一次的交易成本，還可利用報酬遞增的特性減少勞力或時間的投入。故，此人不會買與賣同一種消費財。其次，我們還可得到另一個結果：如果一個人會賣東西，則他只會賣出一種他所生產的消費財。這個結果也來自於報酬遞增的生產技術。如果他不只賣一種消費財，則他就必須生產兩種以上的消費財。如前所分析，報酬遞增技術的假設告訴我們：只要市場上不同商品的價格都一樣，將勞力集中於生產單一消費財所得到的產出價值，要比分散勞力的各產出價值的總和要大。此外，他還可以減少多賣出一種消費財所須付出的交易成本。因此，他會只賣一種消費財。另外，如果一個人不賣出任何產品，則他便無從取得他人的產出；此種情況下，他孤立地自給自足。

至此我們得知：一個人不是自給自足，便是出賣一種他所生產的消費財去交換其他的消費財。我們曾假設每個人都需要多樣化的消費；因此，如果生產的消費財種類不夠時，則此人必須進行交易。我們可以想見：當交易的財貨種類增加導致交易



圖一 兩兩分割的交易

令起始的個人生產與交易情形為：每一個人都生產三種消費財、賣出一種消費財、並只買入另一種消費財。則分割交易顯示兩組並行的交易：甲與乙為一組而丙與丁為另一組的兩兩交易。

成本增加時，此人反而可能願意偏向多從事幾種消費財的生產。雖然分散生產降低了報酬遞增性能夠提供的利得，但也減少了交易成本。在利害衡量下，個人的選擇會是：生產多種消費財、賣出其中一種消費財的部分，以交換其他消費財。

交易是互通有無的買賣。儘管我們已得到上述的個人生產與交易的起始情形，但還無法預測整個社會的交易運作情況。為此，我們以四個人四種消費財的社會為例說明。若令起始的個人生產與交易情形為：每一個人都生產三種消費財、賣出一種消費財、並只買入另一種消費財。由於假設每個人的喜好與生產技術都相同且消費財的交易價格相等，於是，我們可以發現社會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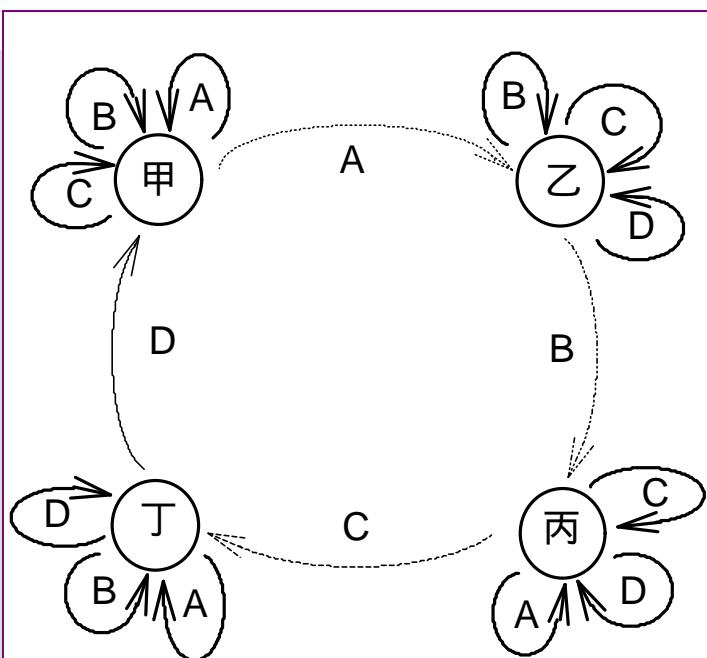
可能會有以下兩種交易型態：兩兩分割交易與循環交易。

讓我們先從最簡單的兩兩分割交易談起，並藉圖一說明。圖中我們以 A, B, C, D 表示四種消費財，以甲、乙、丙、丁表示此四人。圖中顯示兩組並行的交易：甲與乙為一組而丙與丁為另一組的兩兩交易，但兩組間並無交易關係。就甲與乙的交易為例說明。根據假設，消費財 A 與 B 的價格相同；是故，甲與乙不但都從交易中得利，且生產出的財貨總價值也完全相當。這個互利而誰也不吃虧的結果是很自然的，因為在前面的對稱假設裡每一個人都是一樣的。此時，甲將把原本在沒有交易下必須投入於消費財 B 的生產上的勞力集中去生產消費財 A，從而取得報酬遞增的利益。此外，兩人在消費財 C 與 D 都必須自給自足。類似的推理也可應用到丙與丁兩人的交易。圖中顯示出丙與丁也從事於消費財 A 與 B 的交易。這並非必然的，實際上他們也可以交易消費財 B 與 C，或消費財 C 與 D，或其他組合。重要的是在這個分析裡，我們得到的結論是：各個人都生產三種消費財，而整個社會可能有兩種、三種、或四種消費財在交易。不過這些物品的交易是在兩兩分割的市場中進行。



圖二顯示循環的交易型態。由於甲在與乙的交易中並沒有得到他所需的消費財 D，且乙也沒有賣出消費財 B，即缺乏欲望的雙重交會，這種交易型態比較容易在貨幣經濟下發生。在循環的交易下，這個經濟社會裡確定的有四種消費財在流通交易。不過，由於我們所假設的交易成本只與交易消費財種類的多少有關，所以兩種型態交易所牽涉的交易成本，對甲乙丙丁四個人而言，是完全相同的。此外，儘管兩種交易型態的消費財流通交易的種類多少可能有所不同，但各個人的交易都是等價的，且利用報酬遞增生產的利益也都相同；因為，每人一樣地生產三種財貨且只交易一種。那麼，究竟何種交易型態會出現呢？

截至目前，我們對兩種交易型態的討論只限於一個時點上的分析。當我們考慮動態的時間因素時，熟能生巧與報酬遞增的生產技術兩種特性就可提供兩種交易型態確有優劣的區分。依據圖一，我們可見在兩兩分割的市場交易裡，消費財 C 與 D 的勞力經驗累積比循環的市場交易的勞力經驗累積要小。因此，隨著時間的流逝與熟能生巧的特性，相同程度的勞力投入會使循環交易市場經濟體系內的消費財 C 與 D 的產出增加的愈來愈快。當此熟能生巧與報酬遞增的利益，比多增加一種消費財的交易所必須付出的成本還要大時，循環的市場交易便能提供新的互利交易機會。相對於圖二只考慮一個人交易一種消費財的情況，在新增的交易機會下，我們可以下頁圖三顯示出新的交易形態。



圖二 循環形態的交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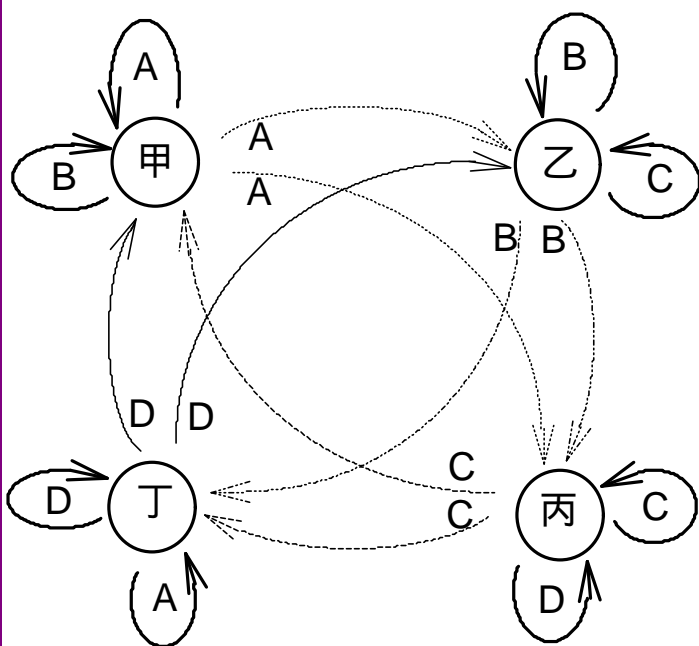
循環交易型態：甲在與乙的交易中並沒有得到所需的消費財 D，而乙也沒有賣出消費財 B。這個經濟社會裡有四種消費財在流通。

顯然的，圖三裡每個人只生產兩種消費財、賣一種消費財、買兩種消費財。儘管每個人生產物品的種類減少了，他的效用卻增加了。個人在購入新消費財的同時會放棄此種消費財的生產。其理由如同前面所分析，交易成本的存在使得個人不買

賣同一種消費財；同時，報酬遞增的特性使他可以從別人處得到更多自己放棄生產的消費財。這個社會裡流通的消費財種類不變，可是每個人的交易伙伴卻增加而成為兩個。

在更專業的生產下，勞力經驗累積愈多，產量愈高。時間向前推進的結果，將使利用熟能生巧與報酬遞增特性的利益更為加大。依照前面的推理，個人的交易伙伴可以再增為三個，同時再減少一種消費財的生產。於是，我們可得到圖四的完全專業化分工生產與整體交易的經濟型態。此時，每一個人只生產他所賣出的消費財，並買入他人專業化生產的消費財。每個人有三個交易伙伴。回顧人類從原始社會裡獨立生產所有消費財，逐漸經由圖二、圖三到圖四的完全專精於一種產品的生產，顯然地，每一個人都充份利用熟能生巧與報酬遞增的生產特性與利益。每一個人的各種消費財消費量都因而增加，而效用也隨之增加。這個結果是建築在演進的初期即採取循環交易的假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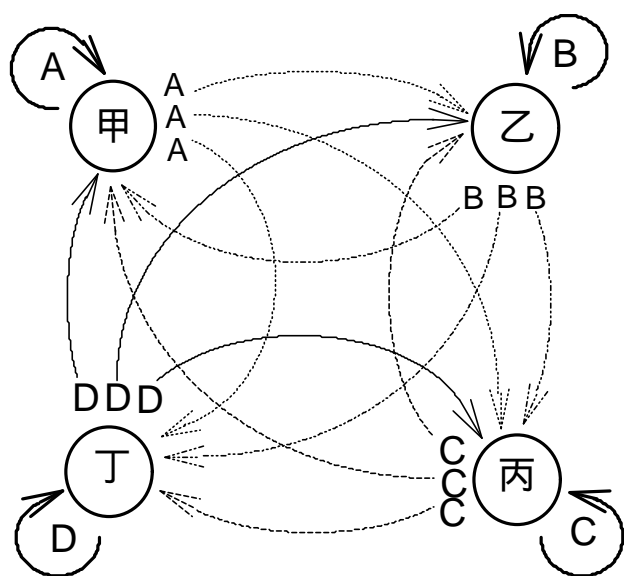
相反的，如果交易只能在分割的市場中進行，則以上的專精生產並不可能發生。讓我們檢查其原因。在圖一的分割市場裡，甲與乙交易而不能與丙或丁交易。所以，儘管甲在消費財 A 以及乙在消費財 B 上累積了勞力經驗，他們卻不可能逐漸在分割的市場交易中演進出專精的生產。如果他們能夠分別專精於 A 與 B 的生產，則消費財 C 與 D 無人生產也無人能夠消費；但是，這個結果明顯的與各種消費財同樣重要的多樣性消費假設相矛盾。同理，丙與丁也不能發展出專精的生產。即使我們假設丙與丁在圖一中分別賣出的是消費財 C 與 D 而非 A 與 B，這個結果也不會改變。要能發展出完全專精的生產，則市場一定不可以呈現出分割的交易型態。



圖三
循環形態的發展

圖裡每個人只生產兩種消費財、賣一種消費財、買兩種消費財。儘管每個人生產物品的種類減少了，他的效用卻增加了。





圖四 完全的專業化分工

完全的專業化分工生產時，每一個人只生產他所賣出的消費財，並買入他人專業化生產的消費財。每個人有三個交易伙伴。

此外，如果我們將圖一的兩個分割市場視為兩個不同的經濟區域，則本節的討論顯示它們未必能合而為一，再逐漸轉型成循環交易的型態以更深化專精的生產。這是由於兩地區的人們在交易前未必能認識到其利益，或由於交通、運輸的不易，或為小糾紛造成的互不信任而阻礙了交易的發生。另外，也有可能的是，既得利益的權力追逐者全力製造衝突以維護或擴充自己的利益。相反的，當循環交易的利得為企業家所認識到並宣揚出去，且阻撓交易的因素都已化解時，經濟成長就可順利的經由經濟區域的專業、分工實現。中國的歷史顯示先秦時期裡各地區間的交易還不普遍，如齊、魯還未能與楚、越充分交易，但到了唐宋期間，今日中國版圖內的區域經濟就已經由交易而連繫起來。現在，台灣的經濟也透過類似的發展過程，不僅與美日有密切的交往，也正發展出與東南亞及中國大陸相連的交易關係。歐洲諸國的歐市共同體也是另外一個例子。其中有些歷史發展的確顯示出王道的文化演進，其它則不幸的牽涉到霸權武力整合下的流離失所。回顧來時路，讓人在對「熟能生巧」感激之餘，也平添幾分惆悵。

綜合言之，本節的討論顯示出當報酬遞增的特性夠強且交易成本夠小時，社會上的人會放棄獨立的陶淵明式的自給自足生產，而從事分工、交易的市場經濟活動。再者，當熟能生巧的特性與時俱增時，每個人的生產將更趨專業化，交易消費財的種類也逐漸增加。在這個發展過程中，每個人的生產力逐漸增高，消費與效用也隨著增高。我們不僅依此觀察到分工合作與交易的發展，也看到經濟成長、生活富裕、與貿易依賴度增高的情形。這種循環的市場經濟發展是完全出於個人的利益計

算，而逐漸演進成功的。不過，這個推演必須基於起使就呈現出循環交易的經濟型態。否則，具有抱負、野心的商人與政客可能就會放棄交易的途徑，而聯手以武力的方式直接進行強迫的區域經濟整合。

工廠生產

個人生產行為的專業化是促成經濟成長的一項因素；另一項因素則是個人工作場所的改變，即由家庭走向工廠。其緣由可以溯往古老農業社會的生活。在農業社會，從播種、插秧、耕耘、以至於晒穀、輾米、煮飯，這一系列的活動都是由家庭成員所參與生產的。割下的稻草曬乾後又可以製成掃帚，還可以用來搭草棚、建茅屋，甚至於可以用做燃料。木材從樹木的砍伐開始，逐漸的加工後可以製成柵欄、桌椅、裝飾物，它們的碎屑也可做為燃料。養蠶、種桑到繅絲、抽繭，以至於從種麻、燒煮到抽絲、紡紗、織布、製衣也都是由家庭生產的。一千多年前的一戶人家在食、衣、住、行等方面，幾乎完全全靠家庭成員的生產來滿足。即使在我們童年的時期，許許多多的日常工作仍然包括了各種不同的家庭生產活動。

三十多年前，台灣的社會裡並沒有液化瓦斯可供使用，更別提天然瓦斯了。一般的家庭都必須要以舊報紙與木屑在小火爐內引燃後，再加上煤炭或煤球才能燒洗澡水、煮飯。直到今天，在大陸上經濟落後的內陸，仍普遍地如此辛苦經營生活。除了費時又耗力外，嗆鼻的煙味與污黑的灰燼也著實令人不快呢！當時也還沒有洗衣機，通常洗衣前先要提水到洗衣盆內，再徒手將衣裳舖在洗衣板上揉搓。清洗完畢後或以竹竿或以繩索掛上衣服曬乾。然而，今天的經濟狀況完全不同，大部份的家庭都有能力從市場上買回瓦斯爐、洗衣機、烘乾機。燒飯洗衣的工作於是簡化了許多。儘管如此，這並不意味著家庭已不須再致力於餐點與潔淨衣服等可供直接消費的生產工作。畢竟，我們還需要打開瓦斯爐的開關、按下洗衣機與烘乾機的電鈕。當然，蔬菜、肉類的清洗與切塊也已有了市場的服務。然而，炒菜或將準備好的食物送進微波爐，以及將脫水後衣服放到烘乾機內，仍然須要家庭人員自己動手。以上的對照顯示出兩重點：第一，消費品的生產可由家庭製造或由工廠製造、再經由市場交易的途徑提供給家庭消費；第二，古代的社會特徵之一在於普遍的家庭生產；相反的，在現代社會裡，工廠生產取代了許多原來的家庭生產。

一個人可以自行在家中獨立地投入勞力與資本財去從事最終消費財的生產，也可以走入工廠與他人合力生產。讓我們首先假設家庭生產與工廠生產具有共同的生產技術。再假設家庭獨立生產時的最佳支配方式是：各級生產都平均的使用到此一家庭所擁有的勞力與資本財。假設家庭於各級生產都使用到 L單位的勞力與K單位的資



本財，而其產出以貨幣所得來衡量是 Y 元。接著我們考慮工廠生產。由於工廠生產的技術與家庭生產相同，我們可以由同樣的推演得到：勞力與資本財的僱用數量並不會因為不同級的生產而不同。然而，此時工廠所僱用的勞力與資本財分別是多少呢？如果工廠僱用 n 個家庭，則它所僱用的勞力總數量是 nL 單位，而所僱用的資本財總數量是 nK 單位。令工廠的產出以貨幣所得來衡量是 F 元。於是，如果要工廠的生產效能高過家庭，則工廠產出的 F 元必須超過 nY 元。換言之，工廠僱用家庭 n 倍的勞力與資本財的產出要大過 n 倍的家庭產出。這就是第一篇定義過的生產過程具規模報酬遞增的現象。由此討論我們知道工廠生產比家庭分別生產更有利的條件是：生產技術必須具備規模報酬遞增的特性。注意，上一節裡，個人生產具有勞力或時間等生產因素上的報酬遞增，而這一節裡的生產技術具有的則是規模報酬遞增，即工廠裡的產出須要多人同時盡心盡力才能遞增。

基於此，我們可知，當生產過程具備規模報酬遞增的情形時，全部層次的加工生產都將發生於工廠。相反的，當規模報酬是遞減的或固定的時候，全部層次的加工生產都將分散於各個家庭。雖然這個結果與現實世界並不全然相符，但以上的討論顯示出工廠生產的必要條件是具有規模報酬遞增特性的生產技術。所以，在解釋生產場所由古代的家庭生產轉變到現代以工廠生產為主的現象時，我們可以循此線索繼續追查。

由於規模報酬遞增的技術使生產集中於工廠，我們還必須尋找另一可能減弱此特性的因素，才能得到家庭生產與工廠生產同時並存的結果。假設工廠生產與家庭生產在處理合作方面的技術不同。此不同的技術主要來自於僱傭關係。工廠僱用勞力時必須付給勞工相當的代價，否則勞工不會願意提供勞力。當勞工的僱用量增大時，如果薪資是按月給付，勞工便可能摸魚或減少工作努力的程度。如果薪資並非固定的而是按件計酬的，則工廠的經理人必須考核、檢驗每一勞工的工作成果。這些都可視為工廠為要結合 n 倍的勞力與資本以取得規模報酬遞增之利益所必須支出的**監視成本**。無論是那一種計酬方式，扣掉監視成本後，工廠在每一級的勞力與資本財僱用上所得到的產出都將比 F 元來得小。

臺灣的**家族企業**工廠有規模報酬遞增的特性而沒有監視的必要。這可能來自於血緣關係所帶來的唇齒相依的親密感情。在一定產量以下，家族可以充份利用規模報酬的利益而並不必要付出監視成本。所以，家族產業生產比完全僱傭關係的工廠生產還有利。然而，家族血親關係的親密感情會隨著家族成員數目的擴大而減弱。當家族產業的產出需要擴張時，它便會開始僱用關係較遠的親屬，如二姨丈妹妹的女兒等。當親密感情減弱後，便需要適當的監視來保障生產效率。若此時的家族產業並不監視生產的投入，則其產出的淨價值可能將不如一個純無親密感情，而賴監視來運作的工廠。故，當家族產業的產量大到需要依賴遠親參與生產時，工廠生產就轉

趨為有利。綜合言之，隨著產出的擴張，生產就逐漸從家庭生產轉變為家族生產，再轉變為工廠生產。這種趨勢是普遍的，任一消費品的生產都是如此的。

除了工廠所要結合的勞力與資本的數量外，影響工廠監視成本的因素還有工廠產品的種類。假設一個工廠生產許多不同的消費品，則各種生產都牽涉監視成本。由於對一種產品的監視成本要比對多種產品生產過程中所牽涉的平均監視成本划算，一個工廠只會生產一種產品。類似的推演，我們可以進一步得到工廠只會專門生產一個層級的產品。

以上的討論完全只是從生產面來考慮工廠的專一生產。我們實質上做了所有工廠產品都能在市場中售出的假設。亞當史密斯曾經說：「經濟發展的基礎在於分工，而分工受限於市場的程度」。當市場不存在的時候，顯然的工廠生產也不容易發揮效益。如果是下游產品的市場不存在，工廠自然不會生存。如果上游產品的市場並不存在，則工廠便需要同時進行兩種加工生產，而無法獲取來自規模報酬的完全利得。當勞力市場不存在時，工廠的僱傭與報酬都必須經過統制的支配。假設市場存在但市場需求不夠大時，工廠生產也未必能展現規模報酬遞增的利得。當市場對某消費品的需求增大時，並不表示市場對其他各級中間產品的需求都會同量的擴大。消費品的數量是由前級的產出決定的。所以，當所有的消費品需求量都同量擴大時，各級的中間產品需求都會一起同量擴張，且愈前級的產品需求量愈大。所以，隨著消費品需求擴張，愈前級的產品將更趨於工廠生產。即使各消費品需求的擴張程度有所不同，愈前級的生產仍然愈趨向工廠生產。因此，我們可以得到：原料工業的走向工廠生產將先於中游工業的走向工廠生產，進而服務性產業也會尾隨其後地蓬勃發展出來。

最後，我們簡單的介紹消費品需求擴大的原因：第一，財產權保障確立市場交易的基礎；第二，貨幣的出現使間接交易產生；第三，人口增加使市場需求隨人數而擴張。一但這些都發生以後，社會裡各個人的財富也都會增加，而使需求量更加擴大。這些討論顯示出社會繁榮與生產形式的轉變都可由經濟分析清晰的瞭解。鑑往知來，我們更須重視財產權、市場、與貨幣制度，並在創新技術的同時設計更精細的制度來降低監視成本，發揮規模報酬遞增的技術潛力。

台灣的經濟發展經驗正是此一理論的實例。三十年前，政策採取出口擴張來充份利用外國的市場需求，因而促進生產形式的轉變，並誘使勞力走向加工出口區，走向全省各地的大小工廠。當市場交易也有其不可忽視的交易成本時，我們所介紹的模型也可加入此考慮。如此，我們即可推論某些工廠會垂直整合以從事數級的生產。不過，這種可能性只有在能節省下的交易成本比增加的監視成本還高時才會發生。相對地，清朝的閉關自守與明清的海禁，則無疑的是中國工業化的障礙。然



而，當時畢竟還有財產權與市場。相形下，大陸共產制度下的長期閉關自守，其對中國人民福利的損害就更甚於明清時代了。

工業資本累積

介紹過分工、專精、與工廠生產等重點後，這一節將討論工業資本累積對經濟成長的影響。為了區分來自技術進步與工業資本的影響，本節將假設工業生產技術的使用，或人們擁有的生產技術都不發生變化。換言之，生產活動是在固定技術下，利用勞動力和工業資本進行的。**工業資本**，簡稱**資本**，是廠房與機器設備的總括性用詞；而**勞動力**則泛指經營管理者、操作機器的技師、與生產線的從業人員。底下，我們先假設人口數目也是固定的，而且想就業的人也已經找到工作；因而，勞動力總數也就固定。於是，產出量的變化就完全決定於資本數量的變化。

我們曾在第3章介紹，勞動力與產出量間的關係受到邊際報酬遞減法則的規範。同樣地，本章亦假設資本量的變化對生產量變化的關係亦受到邊際報酬遞減法則的規範。理由是這樣的：想像一家勞動力為二十人而車床只有兩台的工廠。假設一台車床，除了需要一人全心操作外，還需要其他三人的配合。因此，這兩台車床的使用狀況算是相當擁擠，有些勞動力還無法使用到車床。五十年代的台灣，當時工人的工資相對於車床的使用成本為低，工廠的老板在比較借錢買車床的利息負擔與工資後，往往選擇類似「十位工人配一台車床」的投入組合。假設外國突然援助一批車床，該工廠分配到兩台，使投入比例變成「五位工人配一台車床」的組合。雖然此時的車床數目仍嫌不足，但已有更多勞動力有車床可以使用。故我們可以假設每位工人的產出都會**倍增**。再假設政府提倡策略性工業，並贈送該廠三台車床，而達到「兩人分配到一台車床」的投入比例。明顯地，五台車床便足以滿足二十位工人，故而有兩台的車床被閒置。這將使每台車床的平均產出降低。若改用邊際產出的術語而言，將如圖五所示：資本的產出量先是快速增加，然後其增加速率漸慢，至資本投入量超過 K_2 後其產出便幾乎不再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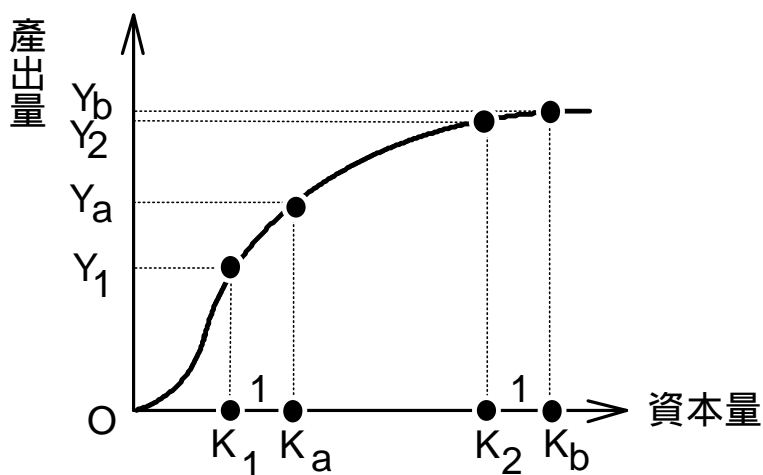
圖中的生產曲線僅表示資本與產出間的技术關係，並沒有時間的內容。成長是涉及時間的，其定義為：**經濟成長率**，或簡稱**成長率**，為兩年之間產出量的增加量佔第一年產量的百分比。譬如，一個經濟體系在第 T 年時的資本量是 K_1 而產出為 Y_1 ，而在第 S 年的資本量是 K_2 而產出為 Y_2 ，則在這些年間的經濟總成長率為 $100 \times \frac{Y_2 - Y_1}{Y_1}$ 。將此數值除以 $S - T$ 年，即是每年平均的經濟成長率。若要分別討論這兩年的成長率，則可以將兩年的期間縮小。譬如，第 T 年時的資本量是 K_1 而產出為 Y_1 ，而在第



T+1年的資本量是 K_a 而產出為 Y_a ，則第 T 年的成長率為 $100 \times \frac{Y_a - Y_1}{Y_1}$ 。同樣地，第 S 年的成長率為 $100 \times \frac{Y_b - Y_2}{Y_2}$ ，其中 Y_b 是第 S+1 年的產出。從圖中可知這兩年的成長率顯然不同：第 T 年時的經濟成長要比第 S 年時的經濟成長大了許多。這個觀察告訴我們：經濟成長率在資本量低時較高，並且隨著資本量的累積而逐漸下降。在圖五中，當資本量超過 K_2 時，經濟成長率則接近於零。換言之，在技術不變的假設下，經濟終歸要受到生產技術的限制而不再成長。

圖五 資本的產出曲線

資本的產出量先是快速增加，然後其增加速率漸慢，至資本投入量超過 K_2 後其產出便幾乎不再增加。



如果勞動量隨著時間增加，則每位勞動人員所分配到的資本數量將減少。因此，只要原來的每人平均資本量不是多到成為負擔時，則資本量的減少雖然會提升資本的邊際產出，但卻使個人的產出減少。明顯地，這將使成長率下降。勞動力的增加也可能促成更專精的分工、形成更具競爭的市場；因此，它也非全然對經濟成長不利。事實上，在第九章討論分工時，我們即已借亞當史密斯的製針工廠的故事指出：分工的最大利益還是在促成技術的成長。同樣地，競爭的市場也不只是讓商品流到最需要它的消費者而已，它更是促使新產品出現的動力。不過，在加入人口成長的考慮之後，如果技術不能持續的進步，則經濟仍有可能陷入停滯而不再成長的狀況。

資本的累積是投資與儲蓄兩行為交會的結果。當個人預見把一塊錢留到明日消費的邊際預期效用，高過當下消費的邊際效用時，便會將它保留下來，即是儲蓄。在另一方面，企業家預見投資於某商品生產的預期利潤高過借款利息時，便會向個人借取其儲蓄。在第二十五章，我們曾討論過金融機構如何扮演溝通儲蓄者與投資者



雙方的媒介功能。假設金融機構運作良好，那麼，影響個人儲蓄與企業家投資動機的因素，也都會影響到資本的累積。在技術不變的假設下，商品的種類與新的投資機會都固定不變。就個人的消費而言，他把金錢儲蓄到明日的效果，只是讓自己在明天消費數量更多但卻是相同種類的商品。沒有新商品的消費激情，更多數量的相同消費只會使明日消費的邊際效用大幅下降。因此，他較佳的安排是每日相等數額的消費。就企業家而言，由於沒有新的商品與機會，他的投資只是再生產相同的商品。生產更多的相同商品，意味著商品的價格會繼續下降，而且利潤也會逐漸減少。於是，企業家缺欠投資動機，而個人也缺欠儲蓄動機。可以預料到，資本的累積速度將甚為緩慢。甚至在資本的邊際產出尚未達到零之前，經濟成長已因缺欠持續投資的動機而完全停滯下來。

以上的分析顯示出：在固定的技術下，工業資本的累積會造成經濟繁榮；但是，遲早成長將停滯下來。因此，只有不斷開創新的技術才可能維持住持續的經濟成長。技術的不斷進步，固然要依賴科學家與工程師的辛勤與貢獻；然而，來自市場的競爭與分工，更是推動技術不斷創新的「看不見的手」。在下一節，我們將在理論上解說這關係；然後在最後一節，再以台灣的經驗加以驗證。

知識的應用

就經濟成長的意義而言，**技術突破**的效果是表現在新商品的發現或某種舊商品之生產成本的降低。如果技術突破的效果表現在**新商品的發現**，就如上節的推論，企業家便多了一種可以選擇的投資機會。只要有企業家預期這新的產品會獲得消費者的喜愛，市場上便會出現新的投資。在資金來源方面，只要市場預期不差，它便不難獲得金融機構的支持。至於市場的消費，在短期雖得依賴富裕者的支持；但在長期，即使預算不充裕的人們，也多少會在新效用的誘導下，設法由平日的儲蓄去實現消費時的滿足感。即使技術突破的效果表現在舊商品之生產成本的降低，企業家也會預期他投資的商品能以較低的價格獲得更廣大的消費者青睞。同樣地，新的投資因而形成，資本量也因而增加。

在短期間內，技術突破的效果或許只會表現在特定的商品上；但是，在長期以後，往往更會發生**擴散效果**。相對於舊技術或舊商品的生產過程而言，生產這些特定商品的新技術必然有其卓越之處，以至於吸引相近商品的生產者的興趣。同樣地在有利可圖的計算下，這新的技術便被擴散到不同的生產部門。最明顯的例子便是電腦的應用，不僅辦公室的文書處理，就連洗衣機、電話機等等都因此技術的應用而變得更智慧。擴散過程需要時間，因此，我們會發現任何技術的突破，都會引發

一連串的新投資，直到尚未引用該技術的部門無法預期到它的效益為止。遲早，投資終將停止，而經濟成長也因而停滯。直到下一種新的技術突破出現，經濟才會再度成長。

讀者一定已經想到：如果新的技術突破能夠持續發生，或者下一個突破總是在前一個突破的擴散過程未停止之前就出現，則經濟不就能無止境的不斷成長？事實上，直到十年前，經濟學家們一直都是採用這類的假設去討論經濟的成長問題。就他們來說，一個經濟社會只要跨過「經濟起飛」的門檻，車頭的引擎一旦發動，持續的成長是必然的結果。因此，新技術的形成與利用是工程師們的工作，不是值得經濟學者關心的焦點。經濟學者只要假設社會存在著一個會不斷湧出新技術的「聚寶盆」即可。不幸地，這「聚寶盆」並未如預期般地按時湧出新技術，有時也會「罷工」。此外，近年來的經濟學者也發現到各國的「聚寶盆」並不和該國的發展經歷成正比。就如前述，既然「聚寶盆」的大小與功能決定性地影響一國的經濟成長，因此關於它如何形成、運作等問題便不能不被經濟學家所關心。

新技術的產生必須寄託在機器設備的製造；反過來說，機器設備也是依照新技術所繪製出來的設計藍圖製做出來的。每個經濟體系都會有一些既存的設計藍圖被用來製造不同的機器設備，然後再去生產消費品。消費品的生產雖直接來自機器，但論其根源，則應說是間接地靠設計藍圖生產出來的。因此，一個社會具有的既存設計藍圖愈多，就可能製作出愈多的機器設備。機器的操作需要靠人力；同樣地，設計藍圖的發明也需要靠人力。如果今日的人力多用於操作機器，則從事於新藍圖設計的人數便降低。其後果將造成明日社會裡的设计藍圖，以及從而製作出來的機器設備與消費財的減少。相反的，若今日的人多致力於明日的新藍圖設計，則為今日生產而操作機器的人力就降低。換言之，在操作機器生產與新藍圖設計上的人力分配不但會影響到今日的消费，也會影響到經濟成長。

除了人力的投入外，如果再進一步假設新設計藍圖的產生率也與既存設計總量成正比的關係，則當社會的既存設計總量愈多時，每期新設計藍圖的產生率也就愈高。這個假設的意義可以這樣來理解：因為現在的既存設計藍圖比以前多，所以現在的大學畢業生比十年前的大學畢業生具有更高的發明力。在此假設下，一個社會的既存設計藍圖愈多，則明日所產生的新藍圖也跟著大幅增加。如果一個社會當初所擁有的設計藍圖不多，則它可以向國外購入或拷貝一些，並因而能於短時間內增加既有設計藍圖的總量，且提升新設計藍圖數量的成長率。事實上，日本、台灣、與韓國的經濟發展都是走這條路過來的。由於比較優勢與時變化，技術未達最尖端的社會隨時都可以從技術先進的社會中找到它們已經失去比較優勢的商品，來為自己服務。譬如，台灣的企業家即使不自行開發新商品，仍可以不斷地自日本或歐美買入次等的技術、設廠生產、再利用台灣的外銷能力賺取利潤。每家大公司的外圍



都有一些共生共榮的小公司，且每個大學附近也共生著許多的餐廳、書店、與便利商店等。因此，若不談民族自主的感情而純就經濟成長而論，台灣的企業即使只知與外商技術合作而不自行研發，經濟成長仍是可能持續的。也就是說，所謂的「淺碟經濟」的貶辭是毫無意義可言的。經濟的成長固然需要技術，也需要自然資源與消費市場。沒有自然資源或市場過小的國家，即使擁有高超的科技，就如日本，仍擺脫不了「淺碟經濟」的指責。如果「深碟經濟」必須是一個具備資源、市場、與科技的國家，則那是一種極荒謬而毫無經濟意義內涵的說法。

我們不否認將經濟成長的動力完全寄託在國外輸入的技術具有極高的風險。然而，走入自由市場本身便極具風險。在市場中，有人成功，也有人失敗。新竹科學園區裡的高科技廠商，每年也有兩成的淘汰率。獎勵廠商自行研發商品，並不一定就能在國際市場中分割到一些占有率。自行研發也好，技術合作也好，商品的成功不在它的科技程度，而在它與市場需要的緊密配合。因此，上一段對設計藍圖與成長間關係的討論，明顯地忽略了一項極為重要的前提：這些設計藍圖必須能被製成市場需要的商品。如何才能使一個社會所具有的設計藍圖生產出市場需要的商品呢？讓我們在下一節就台灣的發展經驗來回答這一問題。

企業家的角色

在這一節，讓我們回顧台灣過去的經驗，看看半世紀以來的經濟成長是如何起飛與維持的。歷史不會一成不變地重演；但在這舞台上，前輩熱忱的演出，則提供我們認識人類長期經濟發展的機會。在第一篇的結語中，我們討論過如何利用實驗方法去了解人的經濟行為。相對於歷史經驗，實驗室的發現，明顯地只是一些在缺欠傳統、短期行為反應、以及幾乎完全掌握的實驗環境下所獲得的結果。然而，那些在實驗環境下無法考慮到的因素，卻攸關經濟成長問題的本質。

在一般用語中，經濟發展與經濟成長是不同卻又難以完全分開界定的兩個名詞。前者被用來描述關於經濟如何突破傳統瓶頸而開始起飛的討論，而後者則專職於起飛後之繼續成長的討論。然而，本書並不作此劃分，理由是：不論成長或發展，都只是人們在一段期間中整體表現的概括性描述。換言之，一段期間的良好表現，並不意味著下一段期間也會有類似的表現。從上一章對經濟波動的討論，以及我們在為歷史讚美的西漢文景之治與唐代貞觀之治的知識中，都知道這些盛世是人的行為的成果。因此，我們在使用「國家機器」或「社會機器」來比擬社會經濟表現時，不應忘了操縱機器背後的人的行為。所謂的「經濟起飛」，並不意味著經濟一旦起飛後就必然機械式地只會更高更好。飛機起飛後是否會立即返航、或墜落、或是繼

續飛行，除了機體的性能外，駕駛員的體力、能力、以及工作態度都是決定性的因素。

1950年代的台灣是個貧困而落後的社會。當時八百萬的人口，在接收日本人帶不走的糖與米的生產事業外，只有規模甚小的煉鋁工業，以及移轉自大陸的棉毛工廠。此外，當時不僅必須面對戰後的惡性通貨膨脹，還要維持近六十萬的大軍抵抗共產赤化。在這種背景下，當時每年的國外貿易總值約兩億美元，其中貿易逆差為三千萬美元，並逐年惡化。到民國四十五年，出口值約為一億兩千萬美元，而貿易逆差卻已達一億美元。更糟糕的是，出口值的百分之八十都來自糖與米的出口。蔣碩傑便曾這樣說到：

台灣的蔗糖出口，那時實際上是由國際協定所決定的，每年由參與國際蔗糖協定的產糖國家來共同決定市場分攤的額度；稻米則專銷日本，每年的數量和價格都由兩國政府直接磋商決定。因此，這兩種主要出口品的彈性實際上是等於零。貶值只會使台灣的貿易條件惡化，使進口品的國內價格提高，而為國內的通貨膨脹添油助燃而已。 <台灣經濟發展的啟示>

外匯，如美元、日圓等也都是商品，如果可以自由買賣，在市場上會有人需要，也會有人供給。其交易價格便是匯率，也就是外匯以台幣計算的價格。台幣貶值就是以更多的台幣去交換一美元，因而會使外國進口品在台灣的價格變貴，並使台灣出口品在外國的價格降低。貿易逆差是進口值超過出口值的那部份。一項商品的價格上升百分之一而引起其銷售數量減少的百分比，稱為該商品價格變化的彈性。既然蔗糖與稻米的外貿交易數量在直接磋商後就已固定，多生產它們也根本賣不掉；這就是上段引文中所稱「出口品的彈性實際上是等於零」的意思。逆差的一個結果是使市場中的外匯需求增加；此時，如果匯率是固定的，則將出現需求超過供給的現象。相反的，如果匯率由市場自由決定，則台幣便會自然地貶值。貶值之後，即使在「彈性為零」之下無法增加糖與米的出口值，也能提升進口品的價格並降低國內對它們的需求，以至於使逆差消失。

當時的外匯並非由市場決定的；因此，強調自由競爭的經濟學者自然的會建議政府模擬市場，採取貶值與貿易自由化政策，好讓價格機能來調整外匯供需的差距。在無法增加出口值以減少貿易逆差的情形下，讓外匯匯率由市場決定，無疑地會造成台幣的貶值，並使國內的進口貨物價更為上漲。然而，在凱因斯學派的眼中，他們除了認為這將會增加廠商的投資成本以至於使投資與國民所得降低外，還誤以為會發生「成本推動」型的物價膨脹。除了凱因斯的論點外，蔣碩傑更指出，當時流行的「彈性悲觀論」宣稱開發中國家可以出口至世界市場的物品都是缺乏彈性的，因此採取貶值政策只會導致貿易條件惡化與通貨（物價）膨脹。



蔣碩傑則極力反對這兩種為政府干預市場鋪路的論點。在上一篇，我們提過奧國學派，尤其是蔣碩傑所師承的海耶克的觀點：市場的自由競爭是一個動態的發現程序。自由競爭市場裡的調整是在發現新商品的動態過程中完成的，而不只是靜態的供給量與需求量的調整。貶值固然無法改變蔗糖與稻米的出口值，但透過自由競爭市場的發現程序企業家自會找到新出路。因此，他信心十足地說到：

我們始終認為，即使傳統的主要出口品是面對著低彈性的國外需要，但是必定仍有好幾百種新的產品，能以廉價的勞工來生產，而且易於推銷到勞動稀少而工資昂貴的國家。台灣擁有充沛而廉價的勞動，實在不應由人為的高估了的幣值將之遮掩起來。 <台灣經濟發展的啟示>

幸運地，民國四十七年以後，當時的政府次第地接納了關於貶值與貿易自由化的一些建議，而沒有錯過「利用國際貿易而將資源重分配的途徑，來增進國內資源之生產力的絕佳機會」。到了民國五十三年，出口值便突破四億美元，貿易差額首次呈現出超，而工業產品在出口值中的比例則已超過百分之四十。

更值得注意的是，台灣也找到了自己具有比較優勢而能在國際市場上競爭的商品。五十年代初期佔出口大宗的蔗糖與米，其實只是戰前日本有意兼併台灣而採行之「工業日本、農業台灣」計劃下的產品，並不適合人口高度密集的台灣的比較優勢。關於這點，蔣碩傑寫到：

在這全島僅有三分之一的可耕地，而且人口密度又高於荷蘭的擁擠的小島上，農產品（如米和糖）一定不是具有比較利益的產品了。具有比較利益的產品一定是那些需要相對的較多人力，而使用土地少，和不用大量資本來生產的產業。因此，紡織品、衣物、鞋子、洋傘、玩具、和其他輕工業產品似乎是早期最合乎台灣的生產因素稟賦條件的產品。那些仍然能夠留在出口品榜上的農產品，也已經改變了特徵。米和糖等需要相當大量土地來生產的產品不再受重視，新的農業出口則係極為勞動密集而使用較少土地者：先是洋菇、蘆筍，接著是鰻魚（輸往日本）和食用蝸牛（輸往法國）。 <台灣經濟發展的啟示>

於是，我們走到了問題的中心：這些具有比較利益的產品是如何被發現的？當貿易逆差、軍事負擔、與通貨膨脹同時從生產蔗糖與稻米的經濟結構下呈現出來時，憂國憂民的知識份子或盡忠職守的政府官員，都可能在參考西方工業成就之後看出「走向工業化」的未來。但是，常被忽略的是「走向工業化」的實踐問題。我國傳統社會與其說是農業社會，不如說是一個商品、技術處於長期穩定狀態的社會。因此，歷代的學者與官員，所思所想的盡是如何找到符合百姓利益的生活商品與生產過程。這些商品與生產技術一旦找到，一個國強民富的遠景便浮現出來。學者與官員

都來自民間，他們亦曾經經歷過與一般百姓相同的生活環境，因此，只要他們不為權力所腐化，便不難為這個長期穩定的社會找到一條出路。在第23章裡，我們提過，經驗、能力與部屬相近的上層長官，只要不徇私護短，便有能力監督下屬的工作。同樣地，與百姓相同出身的官員，其作為也較能符合百姓的盼望。因此，像范仲淹那種「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情懷，我們不必像殷海光一樣地對其加以嘲諷。畢竟，從經濟分析角度上看，在長期穩定的社會裡，悲天憫民的情懷是落實國強民富遠景的必要條件。

但是，當我們的經濟制度轉向自由市場之後，長期穩定的特性便不再存在。不論是在農業產品、或工業產品、或今日大幅成長的服務業，自由市場的例行操作是競爭的。在市場中，不受顧客青睞的商品固然無法生存，即使是受顧客熱愛的商品，其利潤也很快地就會消失。自由的含義在於個人能自由地進出市場；因此，當某商品的提供者有厚利可圖時，就會吸引新的提供者進入。不多時，這些厚利就會消失。如果這時還想賺得較高的利潤，則唯有繼續尋找新的商品、降低生產成本的技術、或開發出新的組織與交易方式。後二者已經分別在本章前面與上一篇中介紹過，本節僅專注在尋找新商品的問題。

當然，這些新的商品仍要在市場上受到顧客的青睞。明顯地，市場裡人們的進出是頻繁的，所謂的商機往往瞬間隨即消失。除了在市場裡的專業人員外，外人所獲得的市場變化的知識，往往都是落後的資訊。在國際市場中，每個國家所推出的商品亦必須面對較國內市場更激烈的國際貿易競爭。因此，在強調要走向自由化時，我們期盼社會跟上的腳步，不在於是否要工業化，而在於是否要擁有對市場變動的機動調整能力。這是一個常被知識份子忽略的觀念。只要擁有對市場變動的機動調整能力，企業家在尋找、推出的商品時，自然會發揮本地的比較優勢。於是，一個人多、地窄的社會，也就自然地會被推向工業化。自由市場是因，工業化是果。不幸地，直到今日，還有許多學者倒果為因，無知地要為「推動工業化」而去設計社會與產業的未來發展方向。

變化的市場既是利潤無法長久維繫的市場，快速地掌握商機便成為在市場中生存的不二法門。當兩國的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競爭時，兩國相對的比較優勢都會在不時地變化。工資率的變動、法令的修改、資源價格的波動、技術的進步、技工的訓練、以及資金的寬緊等等，都會改變兩國現有的比較優勢。當一國在某些商品呈現出比較優勢時，就是所謂商業機會的出現。然而，商業機會是主觀的，是企業家綜合了個人的資金的運用狀況、掌握員工的能力、對法令的了解與運用能力、與官員和其他廠家的人情網絡等等的判斷。換言之，商業機會的掌握牽涉到企業家在推出新商品時的機會成本評估。因此，某甲認為有利潤的商業機會，未必某乙亦會認為有



利。如我們再三強調地，儘管他們可以偽裝成先知，知識分子與政府官員實際上都並無能力為企業家提供商業機會。

至於台灣企業家對國際間商業機會的掌握，蔣碩傑曾作了甚為生動、精彩的描述。他說到：

為求出口持續成長，台灣只有不斷的設法開發新產品和尋找新市場，我們可以在台灣的農業和製造業出口品中找到許多例子來說明。正如上面提過的，台灣的人口密度快速增加，使得生產稻米變為無利可圖，於是台灣開始生產只要很少量的土地，而可在小棚中一層一層的稻草堆中種植的香菇作為新的出口作物，此種作物很快地擴張成新的主要出口物，一年出口值超過一億元。然而，美國很快地便對台灣的洋菇出口設限，台灣只好另外找到歐洲共同市場作為洋菇的新生路，同時又開發蘆筍作為新的出口作物。但是，同樣的故事也發生在蘆筍，美國及歐洲共同市場也很快地對台灣蘆筍出口量設限。因此，台灣就得不斷的開發新的出口品和尋找新市場，如銷往日本的鰻魚和洋蔥，以及銷往法國的食用蝸牛等等。製造品的擴張也遵循相同的路線：紡織品、鞋子、洋傘、黑白和彩色電視機、機械和電動玩具等等都曾次第遭受美國和西歐國家的設限。台灣出口成長之所以能夠如此輝煌，完全是由於台灣的企業家能不斷的發展新出口商品和不斷的開發新市場。

< 台灣經濟發展的啟示 >

稍做延伸，這一段敘述也可說極為深刻地刻畫出今日台灣的企業家在國際市場中的奮鬥經歷與面臨的挑戰。一方面，許多有利潤的商品，不多時即遭受進口國家的設限；另一方面，東南亞以及大陸新興的工業商品亦緊追於後。這種雙重壓力無疑地遠較六、七十年代為重。然而，我們想強調的是，激烈的競爭本來就是自由市場的本質，沒什麼好憂慮或擔心的。就如蔣碩傑所說的：「企業家若是夠機靈的話，他們應會不斷而快速的發展新的出口品，或為舊的產品開闢市場...；如此週而復始的演進下去」。事實上，不只是我國受到前後壓力，同樣地，日本與歐美也會感受到來自四小龍的壓力，而必須進一步開發更高性能的產品。此外，大陸與東南亞國家也有相互競爭以及來自技術更落後的非洲大陸追求開發的壓力。在自由市場下，每位競爭者終將找到能接納他的商品的市場。這些商品，當然是該國生產能力在國際社會中之比較優勢的呈現。然而，一國所呈現的比較優勢是否它真正的生產能力的表現呢？這倒是我們所憂慮的。從過去的發展經驗中，我們沒有理由去懷疑本地的企業家缺乏尋找我們具有比較優勢之商品的能力。我們憂慮的是：他們所能採行的比較優勢，已不是本地資源的生產能力所能自然展現的比較優勢，而是遭受到諸如政府計劃、法令限制、黑道恐嚇、與群眾運動等干擾而被扭曲後的比較優勢。

分組討論

1. 既然企業家自會去開闢市場，打拚出一番局面，那麼鋼鐵廠、石油提煉廠、或航太工業等的生產性工作交給政府辦理也未嘗不可。真，偽；請討論。
2. 據報載，一位曾經休習鑄金技術的國中生，畢業後可以立刻進入銀樓工作並月入伍萬元。相反的，大學畢業生的薪水往往不超過三萬。由此看來，知識的累積並不怎麼值錢。這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病態。你認同這個評論嗎？請討論。
3. 經濟成長是專精、分工的結果。那麼，經濟規模的生產是經濟成長的主因之一，還是交易成本降低後的結果。請討論。
4. 企業家是具有卓越科技的人嗎？為什麼企業家中有不少人只有小學畢業的學歷？又，為什麼許多發明家得到發明上的專利權後，卻無法完成生產？請討論企業家的意義。
5. 經建會又宣佈修正今年的預期經濟成長率。近年來，台灣每年的經濟成長率，從數年前超過10%的數字持續滑落到不及6%。請討論其可能原因為何？

